

Gao Dao Ren Jian

高蹈人間

——六朝文人心態史

Liu Chao Wen Ren Xin Tai Shi

孫若風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苦難的六朝，是中國文人心靈的煉獄。東漢以來的離亂依然纏繞六朝，
成為文人難以揮去的噩夢。

直到六朝最後一個小朝廷的宋代君王陳后主倉皇受縛才告結束。

西晉統一未久，“八王之亂”猝不及防中襲來。

于是綱紀大壞，海內板蕩，宗廟播遷，士人遯轉。

偏隅江左的東晉在危機四伏中支撐了一陣后，被劉宋取代。



接着是齊、梁、陳相繼登場。“孫恩之亂”、“桓玄之亂”、“侯景之亂”
天下多敵，血雨腥風，使文士飽受憂懼和刺激。

北望大江彼岸，也是大故迭起，風雨如晦。

五胡十六國混戰一百多年。

北魏統一，又分裂為東、西魏，再又是北齊、北周。

一件件皇袍委地，一個個英雄授首，也一次次把文人推入迷亂的漩渦。



多少文人血染衣冠！

華卓越的孔融、禰衡、何晏、嵇康、張華、陸機、陸雲、潘岳、謝靈運……
是一串觸目驚心的名單。

僅如此，文人的心靈世界也嚴重失衡。

蕩的社會使文人成為精神上的離群索居者。

朋維不攜，社會不再是溫暖的大家庭。文人必須認真考慮全身自保的問題。



高蹈人间
——六朝文人心态史

孙若风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蹈人间:六朝文人心态史/孙若风著. -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.5

(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/陈桐生,刘怀荣主编)

ISBN 7-5434-4161-6

I. 高… II. 孙… III. 知识分子-研究-中国-六朝时代 IV. D691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180 号

书 名 高蹈人间——六朝文人心态史

作 者 孙若风

责任编辑 郝建国

封面设计 刘 昕

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)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09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34-4161-6/D·28

定 价 19.1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绪 论	放达与执著：六朝文人心态的两元	[1]
第一章	建安发唱	[13]
一	通脱第一人——曹操	[13]
二	继踵风流——曹丕、曹植	[25]
三	邺下风骨——建安七子、蔡琰、祢衡	[40]
第二章	正始逸调	[53]
一	苦闷中的癫狂——竹林七贤	[53]
二	为时代立言——何晏、王弼等玄学家	[75]
三	琴心·仙骨·酒神·药魂	[96]
第三章	中朝浮响	[108]
一	梦遗金谷——陆机、潘岳、刘琨、石崇	[108]
二	玄度无碍——自适·机锋	[127]
三	审美人生——生活美·艺术美·情感美	[138]
第四章	江左远韵	[148]
一	衣冠渡江——在北望中反思	[148]
二	玄学理想的现实范本——王导、谢安	[156]
三	兰亭中的畅想——王羲之等玄言诗人	[166]
四	佛玄汇流中的新变 ——支道林、慧远与孙绰	[175]
五	玄士绝唱——陶渊明	[184]

第五章 声咽南朝	[198]
一 偏执的高蹈——谢灵运	[198]
二 脂红粉白——走向宫体的文人	[208]
三 泣血的蜕变——王肃、王褒、庾信	[221]

绪论 放达与执著：六朝文人心态的两元

一

苦难的六朝，是中国文人心灵的炼狱。

东汉以来的离乱依然缠绕六朝，成为文人难以挥去的噩梦，直到六朝最后一个小朝廷的末代君王陈后主仓皇受缚才告结束。西晋统一未久，“八王之乱”的风暴就在人们猝不及防中袭来。于是纲纪大坏，海内板荡，宗庙播迁，士人蓬转。偏隅江左的东晋在危机四伏中支撑了一阵后，被刘宋取代，接着是齐、梁、陈相继登场。“孙恩之乱”、“桓玄之乱”、“侯景之乱”，天下多故，血雨腥风，使文士饱受忧惧和刺激。北望大江彼岸，也是大故迭起，风雨如晦。五胡十六国混战一百多年。北魏统一，又分裂为东、西魏，再又是北齐、北周。一件件皇袍委地，一个个枭雄授首，也一次次把文人推入迷乱的漩涡。

有多少文人血染衣冠！才华卓越的孔融、祢衡、何晏、嵇康、张华、陆机、陆云、潘岳、谢灵运……这是一串触目惊心的名单。仅在正始年间，就“同时斩戮，名士减半”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浚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）。不仅如此，文人的心灵世界也严重失衡。

动荡的社会使文人成为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。纲维不摄，社会不再是温暖的大家庭。文人必须认真考虑全身自保的问题。西晋潘尼作有《安身论》，开宗明义就是“盖崇德莫大于安身”，他提出，要“以

造化为工匠，天地为陶钧，名位为糟粕，权势为埃尘，治其内而不饰其外，求诸己而不假诸人，忠肃以奉上，爱敬以事亲，可以御一体，可以牧万民，可以处富贵，可以居贫贱，轻盛衰而不改，则庶几乎能安身矣”。（《晋书》庾传引）这是一种息交绝游的办法。即使身处稠人广众之中，也应玄默自处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注引《名士传》介绍庾敳：

虽居职任，未尝以事自婴，从容博畅，寄通而已。是时天下多故，机事屡起，有为者拔奇吐异，而祸福继之。敳常默然，故忧喜不至也。

身不系世务，口不言是非，依违两可，作乡愿嘴脸，只是为了乱世之中苟全性命。在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，他们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办法。孙盛《晋阳秋》引东晋隐士戴逵对当时名士王戎的评语：“王戎晦默于危乱之中，获免忧祸，既明且哲，于是在矣。”他们为远祸而遗世、遁世、玩世。即使刚烈、切直如嵇康，《世说新语·德行篇》注引《嵇康别传》云：“康性含垢藏瑕，爱恶不争于怀，喜怒不寄于颜。所知王浚冲在襄城，面数百，未尝见其疾声朱颜。此亦方中之美范，人伦之胜业也。”《德行篇》载：“王戎云：‘与嵇康居二十年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’”嵇康在其《家训》中这样告诫儿子：“宏行寡言，慎备自守，则怨责之路解矣。”他们将自己与尘世隔绝开来，行为缥缈，言谈玄远，走进独往独来的心灵天地。

动荡的时政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进退失据者。政治向来是古代文人生活的轴心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是他们实现一生抱负的首选，这在六朝也不例外。虽然先秦时就有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名”的说法，但他们总是希望通过立功来立德、立名。六朝文人中也确实产生了杰出的政治家，如为稳定江东做出重大贡献的名相王导，还有再起东山、在淝水创造以少胜多军事奇迹的风流名士谢安。权力，特别是政治权力，在六朝文人那里并没有失去诱人的光环，为达到目的，有人甚至攀附权贵，为人所不齿。如孤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四十九载：

潘岳、石崇附贾谧，望尘而拜，不待言矣。而刘琨、陆机，亦皆附谧，在二十四友之数。赵王伦之篡，乐广号玄虚，仍奉玺绶劝进，而刘琨则为伦所信用，晋少贞臣如此！

在六朝，文人如此失节行为并不少见。还有一些文人出仕，则是由于统治者的压力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载：

嵇中散既被诛，向子期举郡计入洛，文王引进，问曰：“闻君有箕山之志，何以在此？”对曰：“巢、许狷介之士，不足多慕！”王大咨嗟。

与司马氏集团不合作的嵇康被杀，对文人无疑是个警告，在这样的時候，出来做官就意味着臣服，曾经与嵇康一起旁若无人地饮酒、锻铁的向秀走上了这条路，六朝三百多年里有多少文人走上了这条路！身不由己地在宦海中沉浮，其中的无奈、恐惧、悲凉、辛酸，可想而知。温文尔雅、位极人臣的王导，面对司马睿日益加深的猜忌和政敌咄咄逼人的进攻，变得唯唯喏喏了；曾“为君谈笑靖胡沙”（李白赞语）的谢安，终因功高震主而引起猜忌，以致同朝为臣的桓伊为他发不平之声，在孝武帝召集宴饮时慨然唱起了曹植的《怨歌行》：“为君既不易，为臣良独难。忠信事不显，乃有见疑患。”文人在魏阙与山林之间进退两难、首尾两端，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与矛盾。

动荡的人生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“客居者”。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，文人就有强烈的漂泊感，古诗十九首云：“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反”，“客行虽云乐，不如早旋归”，“思还故里闾，欲归道无因”。在六朝，这样的感慨和叹息也不绝如缕，而且，因为与东晋以来的故土沦丧之痛相联系，更加沉痛。簇拥司马睿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，成了侨姓士族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载：

卫洗马初欲渡江，形神憔悴，语左右云：“见此茫茫，

不觉百端交集。苟未免有情，亦复谁能遣此！”

卫玠在兵荒马乱之中携家渡江，见江水茫茫，不禁心神惨淡，忧思难遣，余嘉锡在《世说新语笺疏》中分析其心境说：“当将欲渡江之时，以北人初履南土，家国之忧，身世之感，千头万绪，纷至沓来，故曰百端交集，非复寻常逝水之叹而已。”在渡江以后的日子里，回望神州，风景依旧，可是在敌人的手中，士人总是怆然伤怀，心绪难平，浓厚的乡愁中有着家国沦落的悲痛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载：

过江诸人每至美日，辄相邀新亭，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：“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！”皆相视流泪，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：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？”

故土难离。古人向来把家乡当作自己血肉的一部分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终老于斯，这被古人看成是自然法则，是动物和人都有的本性，所谓“狐死必首丘，越鸟巢南枝”。背井离乡使他们觉得如同失去根的浮萍，是活着的孤魂野鬼。王导以克复神州相鼓励，六朝也有过几次大规模北伐，但返回故土的热望一次次成为泡影，文人也在失落中变得颓唐、消沉。偏安江东日久，不少人开始回避北伐一类的话题了，有人甚至不愿要与“北”相关的名号的将军了，《晋书·王恭传》谈到王恭拒绝“平北将军”称号时说：“初，都督以‘北’为号者，累有不祥，故桓冲、王坦之、刁彝之徒不受镇北之号，恭让表军号，以超受为辞，实恶其名，于是改号前将军。”不可否认，的确有人害怕战争的风险，也有人认为战争的条件还不成熟，还有人担心战争为阴谋家利用，但无论如何，在这样的对“北”字的冷漠、忌讳中，仍时时可以看到那一旦触摸就会流血的心。被称作“侨姓”的士人，成了精神上也是“侨姓”的群落，无处归依。流离的人生，把文人也送上了精神上永无归期的流离之途。梁朝的庾信出使北魏被强留下来，虽官至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但诗中总有涸鲋思水、惊鸟失林、风云变色、松竹悲吟的愁苦，其《哀江南赋》序云：

信年始二毛，即逢丧乱。藐是流离，至于暮齿。燕歌远别，悲不自胜；楚老相逢，泣将何及。畏南山之雨，忽践秦庭；让东海之滨，遂餐周粟。下亭漂泊，高桥羁旅。楚歌非取乐之方，鲁酒无忘忧之用。

他们不知何处是故乡、何时会有归期，成了孤苦无告的游子。他们渴望心灵上的宁静、安稳、有所依托，也希望最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庇护、拯救自己。

二

玄学风靡魏晋，文人几乎无不浸染其中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玄风独振的时代。

“玄”，出自《老子》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。魏晋士人奉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为“三玄”，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，故称“玄学”。

在魏晋不长的历史里，特别是在急剧动荡的时局中，玄学却得到充分的发展，经历了几个演进阶段。据《三国志·魏志·荀彧传》裴注引何劭《荀彧传》，在魏太和初年，荀彧就来到京师，与傅嘏、裴徽谈论虚胜、玄远问题，并且初步形成了“以无为本”的主流思想。正始年间，身为吏部尚书的清谈领袖何晏，开创玄学时代，“援老入儒”，作《道德论》、《无名论》，但很快就折服于当时的哲学天才、未及弱冠的少年王弼。王弼作《老子注》、《周易注》等，主张“贵无”，“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”（《晋书·王衍传》），提出“有无”、“本末”、“体用”、“动静”等一系列范畴，认为“名教”出于“自然”，创立“贵无论”体系，为玄学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。与何晏、王弼同时又有阮籍、嵇康，主张“自然”、“无为”，提出“法自然而为化”（阮籍《通老论》）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（嵇康《释私论》）。此时玄坛还有另一种声音，裴徽反对“以无为本”，认为“始生者，自生也”，“济有者皆

有”（《崇有论》）。向秀注《庄子》，“发明奇趣，振起玄风”，郭象又紧跟，“述而广之”，认为“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”，“块然而自生”，“外不资于道，内不由于己，掘然自得而独化”（《大宗师注》），认为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，并主张“名教”即“自然”，这就是调和“贵无论”与“崇有论”的“独化论”。到了郭象这里，玄学发展到极至，他的《庄子注》一出，玄风大畅，“儒墨之迹见鄙，道家之言遂盛”（《晋书·郭象传》）。东晋时，玄谈之风一度兴盛，但它的命运也面临转折——佛学东渐，与玄学合流，玄学在将自己的一些精华注入佛学后，终于衰落了。

玄学成为魏晋思想的主要潮流，是哲学演进的逻辑必然。东汉儒学已经走到尽头。西汉时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董仲舒以“天人感应”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在统治者的支持下成为统治思想。他倡导“君权神授”，神化皇帝的权威。他还把阴阳家的学说引进儒学，用阴阳五行比附人事，给儒学涂上了神秘色彩。东汉的一些经学家走得更远，使儒学进一步谶纬化、神学化，儒学成了哲学怪胎。黄巾大起义摧毁了汉王朝的中央集权，也摧毁了“君权神授”的荒诞神话，东汉儒学的一统天下结束了。东汉儒学被抛弃的另一原因，是它的过时的研究方法。东汉经学家的章句之学牵强附会，繁琐不堪，已经没有理论意味和研究气息，窒息了学术生命。

玄学家解放了绝境中的哲学。与汉经学家不同，玄学家思考的中心不是君权，而是人的处境；思考的重点不是政权与神权之间的关系，而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；要论证的不是现在政治秩序的合理性，而是人生存的合理性。哲学被赋予一系列新的范畴、命题，也被赋予鲜活的生命。玄学家试图回答人当下的困惑，尤其是刚挣脱经学思想的束缚且又身处乱世时人们的困惑。他们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理论，并且实践这些理论。尽管玄学仍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作用，特别是在东晋之初帮助名相王导稳定了江东政治局面，但相对来说，哲学与政治的直接关系被疏离开了，哲学不再是神学的附庸、政治的奴婢，哲学谈论者的心理放松了，进入了相对自由的学术境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转折。在研究方法上，玄学家重静默玄想、顿然领悟，而不是冬烘式地旁征博引，当然也不再需要长

期钻故纸堆，不需要像传说中的董仲舒那样十年闭户不出。也只有如此，王弼这样的少年才得以脱颖而出。哲学变得有意思了，很多士人被这种魅力所吸引。

如果寻绎由东汉儒学到魏晋玄学之间的轨迹，在它们之间，东汉和魏晋时的人物品鉴也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。东汉实行“察举”“征辟”制，魏时实行“九品中正”法，它们的目都是为统治者选拔人才，但是，在这过程中，对人才的种种认识，特别是刘劭的《人物志》，给后来玄学提供了理论积累，如玄学中的“才性之辨”，在东汉就已经是品人时的题目了。而东汉末年品人时“匹夫抗愤，处士横议”，汉末至三国时品核人物注重个性精神，更给了玄学家精神上的营养。

玄学的兴盛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。朝代的频繁更换，政局的变幻莫测，导致了掌权者的短视和政治活动的无规则，使文人无从把握时局的走向，也无从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乃至人生命运。士族集团间的相互倾轧、屠戮，士族集团内部的相互反目、出卖，更令文人胆寒和灰心。他们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他们的心灵需要一个栖息地和避难所，也需要一个宣泄的场所和进取的目的地。玄学适应了这样的要求。六朝文人创造性地运用道家思想，出入儒道，内圣外王，建立了玄学，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世界，也由此构筑了新的心理世界。世象的喧嚣纷扰，人事的白云苍狗，都不足以挂齿了，他们要在玄学里自足自乐。

魏晋文人的特殊心理使得他们选择、创造了玄学，玄学又润泽、陶冶了他们。他们相信这就是心灵的皈依。玄学塑造了一代文人，它抚慰、庇护了文人，丰富、提升了文人，当然，作为一种思想范式，在有些方面也限制了文人。

三

六朝文人个体意识觉醒，是人的自我认识的一次重要演进。

神是不足以依靠的了。先秦理性已经摧毁了神的地位。诸子中除

了墨子时而信鬼时而不信鬼，似乎在游移之中，其他人对神鬼已没有兴趣，更谈不上敬畏和依靠了。庄子偶尔言及鬼神，但基本上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孔子的态度是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并且是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将鬼神问题悬置起来，使之处于缺位状态。汉儒把经学谶纬化，鬼神观念有所回潮，但是，这样的神话与东汉政权一起终结了。魏晋时期部分文人中流行薄葬，曹操是这方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，陶渊明表示死后要“托体同山阿”，就显示了鬼神意念的淡薄。虽然在乱世中鬼神仍然有市场，是很多人的精神寄托，干宝的《搜神记》就是证明；佛学在齐梁时几度废兴，佛学思维甚至影响到文人的思维方式，但是，没有几个文人真正将自己完全交付给鬼神。也正是这种理性精神，阻止了佛教成为国教。范缜在佛风甚嚣尘上时作《神灭论》，其观点和勇气两方面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。

社会群体的怀抱也不让他们感到温暖。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分崩离析，人们对君王的普遍失望，导致了社会群体心理的涣散。文人们虽然在脆弱的朝廷出将入相，但朝廷实际上已不再具有向心力。文人不能为一个目标而戮力同心，也因而失去了一种相互亲和的力量。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晋初司马炎与王祥二人提出的不同的做人标准。司马炎在即将登上皇位时发布了一个举拔人才的命令，标准有六条：

一曰忠恪匪躬，二曰孝教尽礼，三曰友于兄弟，四曰洁身劳谦，五曰信义可覆，六曰学以为己。（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）

而入晋三年后病死的王祥给子侄的遗训则是：

夫言行可覆，信之至也；推美引过，德之至也；扬名显亲，孝之至也；兄弟怡怡，宗亲欣欣，悌之至也；临财莫过乎让。此五者，立身之本。（《晋书·王祥传》）

司马炎置于首位的“忠”，王祥不屑一提。王祥是六朝少有的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文人，他的“卧冰求鲤”的故事收入《二十四孝图》，

其弟王览对他的友爱的故事收入《二十四孝图》，故事是否有夸张和虚构，存而不论，但这是一个有名的孝友之家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当时的人屡屡提及。以王祥这样的正统人物尚且对忠于朝廷十分淡漠，更何况其他人。“孝”在六朝被突出出来，它说明，人们对血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已经没有信心，他们只想在家族内部寻求道德的完善。

“孝”又能给他们看到群体的力量吗？亲情总是能给人慰藉和温情的，但在深层次上仍不能排遣文人的孤独。先秦儒家讲“孝”，是与“忠”相联系的，所谓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文人的理想也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互为表里，互相补充，互相证明。将“忠”与“孝”割裂开来，弃“忠”而言“孝”，这样的“孝”已经被抽去了根基。而六朝事实上也是兄弟冷漠，各求自保，大难来时，飞鸟各投林，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俯拾即是。

个体被剥离出来了。不论文人是否愿意，现实无可回避、也无法选择地摆在每个人面前。这一定在文人的心里引起了剧烈的震荡，个性意识也就在痛苦中诞生了。

文人认识到自己是独立的存在，神并不在眷顾自己，社会群体并不在拥抱自己，他们无所依傍，除了自我拯救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们踽踽独行，了无遮蔽，一任凄风苦雨的抽打。这是个性凸现出来时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此时，有人恐惧了，退缩了，企图返回原来的心理世界。我们看到，当时有人倡导儒学，并希望恢复旧有的秩序，除了司马氏集团是要以此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外，其他人还是怀着回到神的怀抱、回到社会群体怀抱的梦想。他们幻想逃避自立，逃避孤独，渴盼外来的支持和温馨。当然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。

经过一番灵魂的挣扎，六朝文人勇敢地面对了自我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六朝文人与自我不期而遇，他们由回避自我，到保护自我，到丰富和发展自我，到证明自我。他们独行特立，狷介不群，在个性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己。当然，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恶性发展个性。如《晋书·光逸传》载：

初至，属辅之与谢鲲、阮放、毕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散发裸程，闭室酣饮已累日。逸将排户入，守者不听，

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之中而大叫。辅之惊曰：“他人决不能尔，必我孟祖也。”遽呼入，遂与之饮。不舍昼夜。

“他人决不能尔”就是他们刻意追求的效果。有些确有矫饰之嫌，但是，把这一切都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，就变得容易理解了。在发展个性方面，他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，无拘无束，从而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彻底地显示了个性精神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矫枉过正是不可避免的，鱼龙混杂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独立的个性唤醒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心理。人格的自由发展和心理取向的多元化，使六朝文人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，一部《世说新语》，就是五彩缤纷的六朝文人的人生画卷。虽然不能说它就完全是实录，但它出自六朝当时人的手笔，至少折射了六朝文人的心态，所以，它仍是六朝的一面镜子。

四

六朝是名士的时代，名士家风对文人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。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这是中唐刘禹锡由王谢家居的变化想到历史的兴废从而引发的感叹。六朝的王谢之家，是中国古代豪族的代表和象征。南朝沈约曾感叹：“吾少好百家之言，身为四代之史。自开辟以来，未有爵位蝉联、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。”（《南史·王昙首传》引）这确实是一个奇迹。王家，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王祥、王览兄弟的后人，历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五朝，十几代人，三百余年，钟鸣鼎食，久盛而不衰。谢家也是世代簪缨，华盖相接。六朝士族如林，琅邪王氏，此外还有陈郡谢氏、陈郡袁氏、颍川庾氏，等等，是当时极显赫的望族。

贵族掌握着六朝，特别是魏晋政治的走向。他们“爵位蝉联”，显宦辈出，以致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。据台湾学者毛汉光《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》统计，两晋南北朝时五品以上官吏共

一千七百七十一人（含仕两朝者），王氏有一百六十一人，其中一品十五人；谢氏有七十人，其中一品四人；袁氏有三十五人，其中一品二人；庾氏有三十三人，其中一品二人。几家与皇室联姻情况是，王氏为皇后者八人，尚公主者十三人；谢氏为皇后者一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；袁氏为皇后者一人，尚公主者一人；庾氏为皇后者二人，没有尚公主者。王戎、王衍、王导、王敦、王彪之、王昙首、王弘、王俭、谢尚、谢奕、谢万、谢安、谢玄、谢石、谢琰、庾亮等等，都是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。其中一些人权倾朝廷，甚至出现过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局面。

有了政治地位，就有了社会地位。封建时代是官本位的时代，即使在六朝也不例外。六朝时隐居成为时尚，但隐居的价值是以做官为参照显示出来的。朝廷邀请出山次数越多、许的官越大，隐居者就越有身份。六朝的大官是士人，大隐也是士人。

士人如此独占风流，当然与门阀保护制度有关。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，由地方“中正”之官按九个等级划分当地的士人，推荐给朝廷，量品录用。这种办法起初不失其公允、合理性。但是，久而久之，推荐的权力操纵在士族手里，这就很难保证“中正”了。他们相互标榜，相互举荐，为官者几乎都产生在自己的圈内。于是，九品中正制走向它的反面，成为最不公平、最不合理的办法，成为官场腐败的根源。两晋南朝沿用了这种办法。尤其是司马睿在中原士族的拥护下渡江，又在渡江士族与南方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政权，更加重了皇权对士权的依赖。

士人懂得与世推移，也是一方面原因。此时的士人在政治上大多没有操守，只求全身自保。“平流进取，坐致公卿”是士人的座右铭。“忠”的观念是没有的，血腥的篡弑，温文尔雅的“禅让”，他们都能平静地接受，并且顺水推舟。而每一位新登基者又希望得到旧有政治力量的支持，彼此在相互为用中相安无事。

但是，把士人长期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归于“九品中正制”的实施和士人的圆滑，还是失于简单。不能不考虑六朝士人的个人素质。诚然，在士人中良莠不齐，即便在个性发展中焉知有些不是在发展纨绔作风、门阀习气？但是，应该承认，这个时期的一些士人

确实是一时才俊。六朝士人重视家风。以王家为例，王氏家族开山人物王祥的家训已见前文，这个家族晚期重要人物、流落北方并被拜相的王褒亦写有诫子著作《幼训》，可见教育问题，包括思想教育、道德教育、文化教育，始终受到重视，已经成为家族传统。正是这个传统，使王家在六朝根深叶茂，在整体上立于不败之地。也正是靠这个传统，在六朝结束后，也就是王家也成为“寻常百姓家”以后，王家仍有四人分别在初唐、中唐、晚唐官至宰相，有的还两度为相。谢家也很看重家风。谢安带领子侄比兴咏物，是流传甚广的故事。阮籍、嵇康都是士族，阮籍不愿意儿子效仿自己的放浪形骸，嵇康也有对子辈的殷殷训导。这样的家风，培养的应该是名士，而不是斗鸡走马之徒。他们中的不少人学养深厚，知识广博，熟悉典章制度，甚至熟悉军事部署，了解历史，洞晓时弊，并且风流倜傥，艺有所长，正如沈约所说的“文才相继”。在名士家风中，长辈督促后辈以儒道双修安身立命是一个方面，晚辈仿效长辈以狂放不羁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是另一个方面，谢安就曾评价王家子弟“落拓之性，出自门风”。

或许可以说，六朝为士人提供了较多的机会，一些士人也抓住了机会。当然，这样不公平的用人机制，压抑了寒族，压抑了更多的人才。历史也为这种对士人的偏袒付出了代价。

总之，混乱时世，玄学精义，个性意识，名士家风，共同造就了六朝文人的基本心态：放达与超拔。混乱时世迫使他们愤而出走；玄学精义鼓励他们遗世独立；个性意识强化了他们实现自我的愿望；名士家风给了他们睥睨万物、傲视同侪的资本，也给了他们遗世独立、身名俱泰的动力。